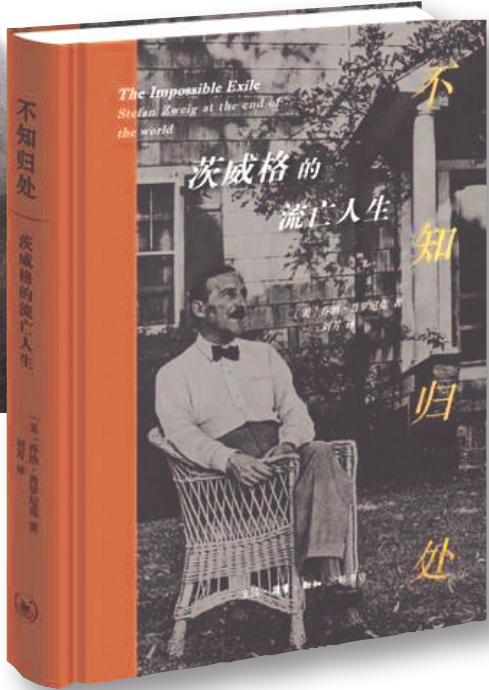


《不知归处》:茨威格的流亡与人生

□符晓



乔治·普罗尼克



1941年7月阳光灿烂的一天,克劳斯·曼在纽约第五大道遇到了茨威格。一直仰慕茨威格的曼发现这个曾被他称为“不知疲倦发挥天赋的人”看起来与往常迥异——不修篇幅且精神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绪中迷失得如此之深,以致他根本没注意到曼的接近。直到被打招呼的时候,茨威格才“像一个听到自己名字的梦游者”一样清醒过来,突然变回人们熟悉的那个优雅的世界主义者。

以上,是乔治·普罗尼克所著《不知归处:茨威格的流亡人生》的一个场景。和茨威格一样,乔治·普罗尼克也是传记作家,兼自由编辑,曾任教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讲授英美文学,著有《追求宁静》《普特南隐身之所》等著作。而《不知归处》则是他2014年的新著,以茨威格晚年的流亡岁月为中心,辐射流散视域下传主对祖国、母语、战争、书籍、种族、朋友、家庭等问题的深度思考,尤其是流亡生活对他生命历程和思想感情的冲击。正如大卫·拉斯金所指出的那样:“《不知归处》既是文学的传记,也是诗化的历史,还包含对战争、艺术和死亡的冥想,令读者对茨威格悲惨又迷人的人生充满了热情。”普罗尼克在这部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将时间聚焦于1941年茨威格在纽约暂

居的那段时光,并以此勾连出关于流亡的前尘往事,凸显了流亡前后茨威格心境的联系和断裂。

克劳斯·曼可以说是茨威格在纽约生活时期经常见到的朋友,这位已经被德国纳粹剥夺国籍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36年开始流亡美国,先后驻留在普林斯顿和纽约,和他的父亲托马斯·曼一起避居他乡。如果说托马斯·曼的流亡勾连出的是他的家族史,那么《不知归处》讲述更多的则是茨威格与他众多流亡朋友的交往史,包括但不限于W.H.奥登、吉普赛·罗丝·李、赫尔曼·凯斯滕、赫尔曼·布洛赫、朱尔·罗曼等。一方

面,比之于托马斯·曼把大部分情感都寄托给子女亲友,茨威格更关心他的朋友对自己的理解,所以前前后后给朋友们写了大量的书信。《不知归处》的作者坦言:“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茨威格的通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通信中,茨威格几乎与朋友们讨论关于生活的一切。另一方面,在流亡的年代,茨威格不能失去任何一位可以通信或可以见面的朋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绝大部分流亡在美国的欧洲作家思考的都是和茨威格相近的问题。1941年的欧洲流亡人士笔会晚宴,茨威格出人意料地为纳粹给全人类造成的苦难道歉,他说,“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公开请求你们每个人的原谅,为今天所有那些打着德意志精神的旗号施加到你们的人民身上的所有事情。”这个讲话赢得了“最长时间最响亮的喝彩”。这足以说明,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都能与茨威格产生共鸣和共情。这也是为什么普罗尼克不断在《不知归处》中强调茨威格之外欧洲作家处境的原因之所在。

然而,茨威格当时面对更多的是欧洲战场和祖国奥地利传来许多不幸的声音。在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不无悲伤地写到,“对我来说,那些天是我一生中可怕的日子:我仿佛每天都听到尖叫的呼喊声从祖国传来;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殴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无能为力。”对于茨威格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一片可以逃遁的土地。这也许是普罗尼克为什么将这部著作命名为“不知归处”的原因。所谓“不知归处”,一是因为茨威格已然没有了故乡,且不说世纪末的维也纳盛世不再,即便是他的祖国奥地利也被纳粹德国吞并,使他成为无家可归之人。此外,一战和二战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导致茨威格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深陷心灵的枯井,变成精神上的异乡人。三是经历二战之后,世界的文化中心已经从欧洲转向美国,茨威格等人曾引以为豪的欧洲文明变得遥远且脆弱,即便身居美国,他也有一种与文明格格不入的疏离感。这些都造就了茨威格的“不知归处”。

也许不会有人会想到,茨威格最后选择了巴西这个他曾经两度到过的国家做最后的落脚。茨威格热爱巴西,眷恋巴西,在他后期的名作《巴西:未来之国》中,他曾经满怀深情地说,“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在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沉沦以及我的精神故乡欧洲自我毁灭之后,除了这里我不愿在

任何地方重新立身。”可是即便是这样,巴西,既不是他的故乡,也不能使他心安,1942年2月22日,他依然选择与年轻妻子一起结束与那个时代的所有关联。普罗尼克在《不知归处》中坦言,茨威格的自杀几乎不可避免,倒是他年轻妻子洛特随他而去令人唏嘘,在证明爱情的同时,更能说明洛特对茨威格走向死亡的理解与同情,也足以证明那个时代对茨威格的伤害之深、压迫之重。

无论是一次又一次的“不知归处”,还是走向临终走向的“必然王国”,普罗尼克对茨威格及其身边人的塑造都坚定而有力。单就创作而言,《不知归处》最原始的力量来自于作者查阅、考证、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茨威格所有的书信几乎都成为普罗尼克的蓝本,在写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加之很多人的回忆录、传记和回想录加持,把一些场景刻画得细致入微,使读者如临其境,更加深了这部著作的史料性和厚重感。而且,普罗尼克虽然记述了很多时间,但是全书并不存在一个绝对顺时的时间维度,而是以若干历史时刻为中心向外辐射或发散,勾连出更为丰富的“事件”和情境,如《爱书之人》一节,表面上写的是1941年茨威格客居纽约的一张旧照,实际上是以此起兴表达传主与书籍的情感和牵绊,其他章节莫不如是。作者对茨威格以及同时代的流亡者饱含同理心,使《不知归处》在情感上更具爆发力和绵延性,进一步确证了普罗尼克的过人之处:他不但对茨威格们具有一种普适性的“理解之同情”,而且从更深的意义上说也洋溢出更为珍贵的“史家之清醒”。流亡,及流亡更深的意义,都被他颇具效力地呈现出来。

在茨威格的流亡深处,汇聚的是他的乡愁。这种乡愁无时无刻不在呼唤故乡、国家、民族、语言。托马斯·曼曾言“我在哪儿,哪儿就有德国文化”,茨威格也说,只要他在哪儿,哪儿就有德国文化。因此,茨威格内心深处浸润的是对欧洲的期待,以及对世界的憧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甚至可以代表他们那一代人,作为流亡作家,茨威格见证了巨大的转换和变化并将之付诸于笔下,他的创作必然成为20世纪浓墨重彩的流散文学范式。尽管命运之手会随时随地把他攫住,把他拽到它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但是历史和文学会永远记住茨威格以及他的流亡与人生。

(作者系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副教授)

■动态

“当代利玛窦”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正南看北斗:一位欧洲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巨变》英文版首发

比利时汉学家吕光东纪实作品《正南看北斗:一位欧洲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巨变》于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期间举行英文版全球首发式。这是一部献给世界读者的了解当代中国之书,将为世界读者提供一扇深入了解中国的窗口。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涛,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章朝阳,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徐海,比利时王国驻华大使馆代表郝苏菲(Hottat Sophie),大苹果事业有限公司总裁陈历莉,中国外文局下属美国长河出版社执行总编辑克里斯托弗·罗宾(Christopher Robyn),译者散树,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等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活动。

于涛代表《正南看北斗》英文版出版方首先致辞,他认为《正南看北斗》是“从西方友人亲历者的视角解读中国并讲述中国故事的一次有益尝试,开拓了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一种新的模式,希望外文局和凤凰传

媒集团今后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交流,共同在世界舆论场上唱响中国声音。

章朝阳对本书英文版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今天,译林出版社邀请比利时汉学家吕光东这位知华友华的“当代利玛窦”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是译林社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的一次新的尝试与突破,也是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的一项重大成果,对促进中外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郝苏菲在致辞中称赞《正南看北斗》的出版进一步巩固了吕光东博士在中比文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作为一位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汉学家和国际版权经纪人,吕光东对中国的研究具有示范性。她还期待,不仅有生活在比利时的中国人也可以向世界讲述他们的故事,从而实现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宋 闻)

莱斯利·马蒙·西尔科《仪式》:

没有故事,我们一无所有

□苏牧晴

近日,美国作家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的长篇小说杰作《仪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这是西尔科的作品首次译介到简体中文世界。西尔科是“美国印第安作家终身成就奖”得主,也是“美国印第安文学四大家”中唯一的女性作家。《仪式》继承印第安口述文学传统,讲述一个身心破碎的混血印第安人在巫医的指引下,通过部落仪式疗愈战争创伤并重建身份认同的故事。《仪式》于1977年一经出版便受到广泛关注和赞誉,是“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时期的扛鼎之作,至今仍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列入美国大学文学课教学大纲。



莱斯利·马蒙·西尔科

混血儿的眼睛

头晕、呕吐、失语……夜夜被梦魇折磨,想要化作一团透明的雾气就此消失。故事开篇,主人公塔尤饱受战争后遗症困扰,在他难以抑制的创伤回溯中,黏稠湿热的记忆如从林雨雾般弥漫出一片绿色的地狱,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场,巴丹死亡行军,几百万战俘倒在通往战俘营的泥泞小路,包括罗基——塔尤的表兄。获释回国后,白人医生对塔尤的精神失常束手无策,他只得返乡,回到贫穷落后的拉古纳保留地,与昔日战友沉溺于酒精、暴力和军人身份曾带来的荣光、浑噩度日。

但《仪式》并不是一部仅仅探讨战争创伤的小说,塔尤的顽疾根植于他自身,由他被白人父亲“玷污”的不纯血脉生发,被族人的厌弃和孤立饲喂。淡褐色眼睛——“混血儿”的印记无法掩藏,难以祛除,他因此遭到族人甚至家人的冷眼,而白人社会也始终将印第安血统视为“异物”加以隔离和驱逐。塔尤的特殊身份是他悲剧经历的根源,也正是这双混血儿的眼睛,让他看到印第安文明和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之间沟通理解的可能性,并最终完成治愈的“仪式”,弥合亘久以来的创伤。

本书作者西尔科与塔尤一样,是由于混血儿身份被族群边缘化的印第安社会的“局外人”。虽然无法参加部落中的传统活动,西尔科依然从她的祖辈,尤其是女性长辈向她讲述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得到滋养,她与印第安传统间的联结从未断裂。而《仪式》一书创作于她远离故乡、定居拉斯维加斯时期。北方的阴沉气候让西尔科陷入抑郁,唯有创作带来慰藉。她在前言中写道:“小说已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神奇飞舟,带我重回西南的土地……通过文字我重新创造了故乡。”故事中,塔尤在同样身为混血儿的巫医比托尼的指引下,通过沙画仪式治愈创伤、重构自我。而小说的创作过程对于作者西尔科来说,无疑是一场自我疗愈的仪式。

未竟的仪式 待续的故事

早在欧洲征服者来到美洲大地,带来文字和“文明”前,原住民已经拥有长达数百年的口述文学传统。“讲

故事”不仅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更是美洲原住民身份构建的基石。词语被吐出,事物便有了实质;词语在故事讲述中被安放在各自的位置,世界的秩序也由此确立。“身份”依存于“故事”,正如西尔科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我们都是在别人的‘讲述’中知道自己是谁的,如果没有故事,我们将一无所有。”

小说中,“讲故事”在塔尤完成仪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仪式开始前,巫医比托尼分享自己特殊的身世故事,让塔尤理解为何他的仪式不同于传统,而是融入现代文明的诸多元素。仪式过程中,塔尤偶遇了神秘女子茨娥(大地女神的化身),后者提醒他,仪式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选择,故事的结尾应由他亲手写就。完成仪式后,塔尤回归部落,进入举行宗教活动的会堂,向族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成为部落文化的守护者。

“故事”与时间一样亘古长存,它联结着古老的神话,也暗含对未来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故事始终是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着的事件,这意味着它随时可以被截断、被改写,甚至被抹除。故事就是人们意识状态的映照。站在美国第一次核爆测试的“三位一体”站点,塔尤意识到白人并非邪恶本身,只是受“黑巫术”操纵的傀儡,唯一的黑暗是人心趋向暴力与毁灭的欲望,它将给印第安人和白人带去共同的终结——倘若人们不时刻保持警醒,团结起来对抗这种黑暗的话。

事实上,人们总是健忘和懈怠,共同面对灾难的时刻过后,怀疑、敌视、冷漠卷土重来,黑巫术从未被彻底清除,它与愈加先进的文明一道,渗透到更远的地方。西尔科借由这部小说,让古老的仪式在崭新的故事中复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开篇和结尾分别由“日出”的祈祷语构成,塔尤的故事即小说主体则发挥着祈祷词正文的效用。这意味着,阅读小说的过程于读者而言,也是一次仪式的实践。故事的能量在阅读中共振、扩散,我们共同参与这场更为广大的治愈仪式当中。在此意义上,《仪式》一书本身,就是一场精心设置的“仪式”。

■书讯

玛丽·劳森《小镇索雷斯》出版

近期,加拿大作家玛丽·劳森的长篇小说《小镇索雷斯》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

秋季的冷风吹进小镇索雷斯,在一幢漆成深绿色的房子里,至亲失踪的小女孩、家庭崩裂的中年男子、时日无多的老妇人,三个陌生人意外撞进对方的世界,涉入彼此的悲欢。他们正在坍塌的人生仿佛注定在索雷斯交错,跨越世代,超越血缘。天色渐晚,一片雪花就要落下,破碎的心在暗夜中守候着,等待愈合,等待回家。

在玛丽·劳森笔下,辽远宁静的北国风光得到空灵的书写,亘古不变的人情羁绊得到温和的审视,人们既承受痛苦、伤害和罪孽,也凭人性深处的善,交付希望和救赎。爱不囿于亲人与家庭,在一片安宁的小镇索雷斯,那些曾遭遇寒风的心灵将得到慰藉。

玛丽·劳森(Mary Lawson),生于1946年,成长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乡村,毕业于麦吉尔大学,获心理学学位。后移居英国。2002年,玛丽·劳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乌鸦湖》出版,一举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长踞加拿大畅销书排行榜75周。此后,她陆续出版三部长篇小说:《道路的尽头》《在桥的另一边》《小镇索雷斯》。

玛丽·劳森始终将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的乡野作为笔下故事的地理坐标,描摹辽远宁静的北国风光,刻画美丽和残酷交织的世代故事,述说人与人之间的羁绊与守望。她两度入围布克奖,还曾入围都柏林文学奖、福里奥奖,被誉为“近十年最好的加拿大小说家之一”,作品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

(宋 闻)



美国印第安艺术家弗里茨·舒尔德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